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4.03.004

突破与创新

——论郭玲春新闻作品的文体特质及贡献*

刘 勇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在新时期的新闻文体发展中,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她在“追悼会新闻”和会议新闻的写作中,率先突破“新华体”的僵化模式,拓展了会议新闻写作的新途径,并逐渐在新闻写作中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由此奠定了她在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引领了新时期的新闻写作改革。

关键词: 郭玲春;新华体;新时期;新闻文体;讣闻报道;会议新闻

中图分类号: G21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14)03-0025-06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记者则是历史初稿的记录者。在30多年的新闻改革中,新闻记者始终是直接参与者与见证者。记者的新闻观念、思维方式与新闻实践都会对新闻文体发展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考察新时期我国新闻文体的变革,“记者”是我们绕不开的基础性维度,诚如有研究者提醒的那样——“新闻学的研究,勿忘记对人的研究——那些在新闻传播中的历史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1]。根据1978年以来新闻文体的变化脉络,我们尝试从“新闻共同体”内基本达成共识的名记者群体中,寻找那些主导了某一特定时期的新闻文体发展潮流的“名记者”予以考察。换言之,他(她)必须首先是业内公认的“名记者”,同时,其影响力更多的是体现在新闻文体范畴内。循着这样的理路,“郭玲春”的名字时常跃入我们的视线。在名记者辈出的80年代,郭玲春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字功底和

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率先突破了“新华体”的束缚,拓展了会议新闻写作的新途径,并逐渐在新闻写作中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由此奠定了她在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第一次冲刺”：“追悼会新闻”的突破

从1980年开始,新闻界呼唤新华体的改革声音不绝于耳,但真正敢于触碰这根敏感“神经”的记者凤毛麟角。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就是其中的典范。她首先从“新华体”最为敏感、也最为刻板的报道类型——“追悼会新闻”——予以突破。1982年,她撰写的消息《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因其在写法与结构上的创新而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

从文体创新的角度看,这篇消息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收稿日期] 2014-03-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CXW005)“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史研究(1949-2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YJC860001)“返观与阐释——新时期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发展研究(1978-2008)”

[作者简介] 刘勇(1978—),男,安徽池州人;博士,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一)突破了“新华体”的僵化模式

按照西方新闻界的划分标准,“追悼会新闻”一般归于“讣闻报道”范畴,其基本理念是“着力寻找普通人一生的闪光点”。与西方讣闻报道相比,中国的“讣闻报道”多在“新华体”的框架内。“新华体”是新华社长期报道国内外新闻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写作体式。由于新华社在我国新闻界的特殊地位,同时也因为“新华体”在结构和叙事等方面的各种优点,20世纪80年代以前,“新华体”始终是“宣传范式”下的主流报道体式,在我国新闻文体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一种文体样式一旦被固定化并且呈现出“一体独大”的状况时,就容易陷入模式化、刻板化甚至僵化的境地。新时期以来,面对日渐丰富的文体实践,“新华体”在刻意强调规范化“定体”的同时,其缺陷诸如用语的“八股化”与“名单学”、信息的空洞化、结构的单一化与模式化等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长期以来,我国“追悼会新闻”的实质是有“讣告”无“新闻”,有“会议”无“信息”,严肃有余而人情味不足。而且,这类报道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意味,在报道对象的选择上首先必须考量的就是逝者的身份、级别与地位,往往不够一定级别是很难见诸报端。与此同时,这类报道的格式也基本趋于僵化。有人将这种写作模式总结为:“导语说明某同志的追悼会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举行;依次写哪些领导人送了花圈,出席了追悼会;某领导人致悼词,摘录悼词的主要段落,对被追悼者的一生作出评价,号召人们学习他的某些方面品质;领导者向家属表示慰问;多少群众参加了追悼会;最后开列参加追悼会的各方面人士的一长串名单。这种千篇一律的格式沿用多年,很少有什么改革变化。”^[2]如此,基于“追悼会新闻”在我国的这种特殊性,新闻界想要突破这一“传统”写法,可谓难上加难。

本篇消息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不仅篇幅较之同类报道大大缩减(全文仅937个字),而且在内容和结构的安排上也做了大胆的尝试。新闻学者黎明洁博士在将本篇消息与新华社播发的另一篇消息《首都隆重举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1978

年6月18日)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在《首都隆重举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一文中列出的人名多达390人,共1990字。其中,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40人,送花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32人,另外参加追悼会的在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53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88人,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分负责人96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分负责人23人,郭沫若生前好友43人等。^[3]由此可见:基于传统“新华体”写成的“追悼会新闻”中,逝者并非新闻的主体,而仅仅是衬托参加追悼会领导的一个“配角”,这一点我们从上述的“名单学”中就可可见一斑了。相比之下,郭玲春的《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一文不仅在形式上大胆“减负”,其写法也更具人情味,从中我们确实能体味到郭玲春为挣脱“新华体”束缚所做出的艰难探索与努力。

(二)运用了散文笔法

本篇消息在写法上的最大特色就是借鉴了散文笔法。我们常说“散文是形散神不散”,其意是说散文的写作虽形式活泼但一定要有立意或贯穿始终的主题,本篇消息的特色就在于此。记者一改同类新闻的惯常写法,导语没有对逝者作更多的政治层面的定性,用“特写”的方式——“鲜花、翠柏丛中,安放着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山同志的遗像。千余名群众今天默默走进首都剧场,悼念这位人民的艺术家”——开门见山地交代了两个基本事实,主体部分则由挽联引出,继而对会场作“全景式”的扫描,行文中又巧妙地将悼词——“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传出九窍丹心,晚春蚕老丝难尽;党业、民功、讲坛、艺苑,染成三千白发,孺子牛亡汗未消”——融入对场景的描写中,亦动亦静,动静结合,突出了消息的“视觉化”和现场感。全文结构看似松散,却暗含了两条基本的叙事线索:以追悼会的进程作为“明线”,穿插其中的关于金山一生的经历与功绩的描述则作为“暗线”,两条线索交替出现,相互照应,凸显了消息的主题。在当时“新华体”一统天下的时代,这种写法确实显得有些“离经叛道”了。

于是,一个个疑间接踵而至——“为什么是

郭玲春?既然文体意识一旦被固化就很难突破,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篇消息的诞生?”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尽管没有证据显示穆青对郭玲春写作此消息给予过直接的指导,但通过时间比对,我们不难发现,穆青重提“在新闻中增加散文形式”的时间是1982年1月17日,而郭玲春撰写此消息的时间则是在同年的7月6日。加之,郭玲春也在对此文写作过程的回顾中做了如下描述——“即使这并不成功的改进,也是在领导和同志们们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的。当我说出初步想法时,便得到编辑部许多同志的首肯,他们都鼓励我不必因循旧例,按自己的意思去做。”^[4]因此,我们能够判断的是,当时新华社内部正在形成的“散文式”氛围促发了郭玲春的文体创新。与此同时,郭玲春写作此文还受到西方新闻报道的影响。据她说,西方通讯社记者采写的关于英国戏剧家萧伯纳去世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促发了她的创新“冲动”——“这似乎不是规范化的新闻,但谁能说它没有向世人传递这一惊人的消息?本来,没有规定报道死讯必须要这样写,或一定不能这样写”^[5]。郭玲春回忆这篇启发她的“范文”的大意是这样的:

伦敦,一个有雾的清晨。萧伯纳府邸前围聚着上百名群众,等候着这位伟人的健康报告。一位身着黑服的老妇人缓缓走下楼来,持着将要燃尽的一支蜡烛。她低下头,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而后告诉众人:“他说,他疲倦了”。人们脱帽肃立,和这位报讯的妇人一起垂下了头……^[6]

当然,时代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篇消息,一定会发现一些不足,比如它尚未完全摆脱“新华体”的藩篱,依然没有突破“名单学”的限制,消息末尾开列的一长串名单,实质就是传统“新华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当时,这样的写法实属“石破天惊”的变革,它不仅开阔了当时记者的视野,也为其时日渐沉闷的新闻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春风。如果说穆青“散文式新闻”的倡导解放了记者的思维,那么,这篇消息写作就是郭玲春从实践层面上做出的一种积极的呼应。有鉴于此,郭玲春称

这篇消息是其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冲刺”,她对此的评价也很中肯——“不按照划定的框架,但必须遵从新闻的规律;借用散文的笔法,总体上又不失为是一条消息,这是付出失败的代价后才得到的教训与成果。当年被肯定的新闻写作上的改革,如今读来,也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文字了。”^[7]

此后,郭玲春开始更加积极地探索讣闻新闻的写作,相继写出了《萧三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李苦禅教授追悼会在京举行》《刘继卣临终前献出巨幅国画〈双狮图〉》《向子冈告别》《眷恋乡土多名作 饮誉中外何寂寞——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等一大批同类新闻作品。与撰写《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时相比,其时的她文笔更加自然、技法日趋成熟、相对独特的个人风格也已逐渐形成。尤其可圈可点之处还在于:她已有意识地跳出就追悼会写新闻的框子,而开始尝试向着真正的“讣闻报道”发展。在西方“讣闻报道”的视野里,讣闻报道首先是新闻,因此记者要善于发掘逝者一生中与人不同的特点,要选择相对平实、委婉的语言。^[8]这些理念在郭玲春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这些报道的共同特点是:导语设计精巧、材料与结构融为一体,语言简练、生动,全文流露出极强的人情味。

以三则消息的导语为例: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著名画家刘继卣今日凌晨辞世。将一生心力付于美术事业的这位艺术家,临终前完成了他的一桩夙愿:把巨幅国画《双狮图》献给了国家。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彭子冈,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名迹的女记者1月9日病逝于北京。因为她默默地离去,人们怀念起她当年叱咤风云的岁月。今天首都各界人士以及她的同仁、朋友、读者前往北京医院,向她作最后的告别。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没有人为他主持这最后的仪式,也没有名人为他致悼词,只有他的家人,他亲近的朋友和弟子,今天在八宝山公墓一个素朴的灵堂里,向他——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告别。

三则导语,三种写法,体现了记者突破传统、

突破自我的努力。在第一则导语中,记者有意没有交代逝者的享年,而是将其放到了文末,据她说这么做“是想试一试五个W,未必一定‘挤’在导语中”^[9]。第二则导语中采用对比手法——以彭子冈现在的“默默离去”与当年的“叱咤风云”相比较,为后文的叙述铺设悬念,造成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接着又在主体部分采用了“粗的勾勒间或也有细的描绘”,由于真实感人,以至有读者以为这篇报道是“出自自亲人之手”^[10]。第三则导语中,记者隐忍个人情感,用最平实的叙述,寥寥数语却表达了最真切的情感。本篇消息在结构安排上凸现了记者的“匠心”:材料使用简约却暗含伏笔,段落之间“上挂下连”浑然一体。作者对此的评价是——“从文弃文,甘苦自知。消息里有伏笔但不明说,以此烘托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白与耿直。”^[11]

二、创新的自觉:常规会议新闻的突破

如果说,郭玲春对“追悼会新闻”的突破更多地源自一种被压抑太久的“职业冲动”,那么,她在常规会议新闻领域的探索则是出自一种文体创新的自觉。1984年,她撰写的会议新闻《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因其独特的风格而再次摘取了第六届的“全国好新闻奖评选”一等奖的桂冠。

作为“新华体”最为常规的报道品种,会议新闻既是新闻改革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长期以来,其报道形式日趋刻板化,有研究者将这种报道“模板”总结为:“某某部门、于某日、在某某地方、举行了某某大会,某某、某某、某某……领导人参加,某某领导主持,某某、某某、某某领导人向获奖代表颁奖、握手,某某领导讲话。会场气氛隆重,某某领导宣布会议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某某领导发表讲话。(领导人讲话很长,但是很少使用直接引语)”^[12]相比之下,郭玲春的这篇消息就突破了传统“新华体”会议新闻的报道模式,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观察细致,视角独特

本篇消息突破常规之处首先在于记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并在报道中选取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视

角。记者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跳出会议,将会议的时间简短与当时的社会节奏加快紧密“勾连”起来——“有七个发言的整个开幕式总共进行了一个小时”,从而凸显了本次会议的意义所在。诚如郭玲春后来总结的那样——“大凡会议,格式程序往往大同小异。不得不奔走于会海的记者,要善于在‘大同’中求‘小异’。”^[13]

(二)活用“引语”,巧“摘”报告

本篇消息的一个成功之处还在于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交替使用。全文一共使用了三处相当简短的直接引语,分别是一位与会者的话、彭真以及徐向前的题词。而对于篇幅较长的中宣部副部长郁文的讲话、吴冷西委托秦川向大会提交的报告,记者一改传统写法中连篇累牍地大段摘引的惯例,选择用间接引语将其中要点概括出来。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行文安排,才使本篇消息化繁为简,重点突出,节奏明快。

(三)个性化的表述

本篇消息还有一个特色就在于采用了具有记者个人特色的表述。导语中的第一句话——“以新闻报道为己任的350余名记者、编辑、播音员,今天成为被报道的新闻人物”——仅34个字就十分精准地概括出与会者的身份,表述上亦令人耳目一新。与此同时,记者还巧妙地将其个人的感受渗入新闻中。比如,她在描绘现场记者的表现时,使用“思路锐敏的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个人判断,而在消息末尾,郭玲春甚至大胆地写出个人感受——“记者在今天的大会上还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气息”,这在传统会议新闻写作中是一种完全“犯忌”的写法。尽管这种写法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当时,却有其特殊的进步意义。

基于以上这些突破,在第六届“好新闻评选”中,评委从新闻改革的高度评价了这篇消息:“这是一篇独具风格的会议新闻。作者突破了千篇一律的会议消息写作的模式,把建国三十五年首次举行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写出了新意,写出了特色,可算是会议新闻改革的创新之作。”^[14]

现实的成功激发了郭玲春进一步改革会议新

闻的信心。这之后,她更加频繁地在自己的新闻写作中融入不同的创新元素。在郭玲春看来,“平实,缺少‘个性’的导语,会使新闻流于一般。”^[15]因此,尝试运用多种手法、不同方式精心写作会议新闻导语,是她始终坚持的一个突破口。

在消息《文艺要贴近时代、贴近群众——首都文艺家谈“文艺与群众”》(1986年)中,她使用了当时并不多见的设问式导语,使本篇消息的主旨即刻予以凸显。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如果一篇刻意求精的诗文没有读者群,倾注心力的剧作和影片也少人问津,你当作何感想?中国作家协会常务书记唐达成的看法是:不写人民魂牵梦绕的事情,人民就会报之以冷淡。

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在京开幕》(1987年)中,她运用了特写式、描写式的导语。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辉煌的灯火托出邓小平题写的“中国艺术节”五个大字,四周是人群与花束汇合的百花丛。赵紫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今晚走进盛装的首都体育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献给腾飞年代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宣告开幕。

在《第五次文代会开幕》(1988年)中,她选择了纯叙述式的导语,将历史与现实巧妙地融汇在一起。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邓小平同志今天走到千余名文学家、艺术家中间。继1979年以来的又一次会面,揭开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序幕。

在《行家们论崔嵬艺术 评论界谈王朔作品》(1989年)中,她又通过对比式导语牵引出两个原本没有任何关联的名字,进而将记者个人思考与社会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一个已故去的艺术大师崔嵬,一个刚跃上文坛的新人王朔,这本不属于同一时代又不相干连的名字,偶然中排列在一起。研讨他们电影作品的两个学术会议,恰好于同一时间(三月初)在北京进行,从而引起记者的联想与兴趣。

与此同时,郭玲春的会议新闻写作中还有一

个尚存争议的写法,即她常常在新闻中“不加掩饰地表露自己的倾向。有时按捺不住,会直白地呼叫、张扬我的观点”^[16]。例如,在消息《在李准、张洁、刘心武接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1985年)中,她就大量采用了这种具有主观色彩的描述。导语部分即以“以作家的敏锐和深沉写出长篇力作的李准、张洁、刘心武今天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明确表明她对三位作家的“敬意”,主体中又对三位作家进行了个人化的“定性”——她形容李准“有经验、有造诣”,称张洁是“有胆识的女作家”,并总结三位获奖作家的每一位“都是勇猛者行列中的一员”。最后,郭玲春仍不忘突出个人的感受,她写道:“记者采访时的一个强烈印象是:他们都自觉地承担起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

对于这种相对主观化的新闻表现手法,郭玲春的解释是:这虽不是“最佳”的方法,却是新闻写作的一种方法,正因为有了“我”的出现,她才能“写会议,由场内‘游泳’到场外;写事,由此及彼;写人,由表及里;长篇宏论,也不妨分段‘切割’,按‘我’的思路组装。”^[17]我们认为,在“新华体”业已成为新闻写作唯一“铁律”的时代里,作为开阔视野、突破“坚冰”的尝试,这种写作方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曾经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同时,应该看到,这种偏于主观的写法与新闻的职业规范形成了一定落差。况且,不同记者对于这种方法的理解决与使用也往往大相径庭。因此,一旦新闻写作开始复归新闻本性,则这种主观化的新闻表现方法就很难上升为整个新闻共同体的职业法则,毕竟,记者只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诚如香港报人董桥所言:“新闻记者只要保住‘记’而不‘议’的原则,消息盛衰,一事多面,据实报道,当是明天的《日知录》。”^[18]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郭玲春在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中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为此,《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对她给予了高度评价——“郭玲春就是这样一位普通而又伟大的记者,她用手中的笔为我们奉献了一篇篇优秀的作品,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会议新闻的写作方

式,创造了一种更加和谐美妙的写作境界,让我们的新闻事业增加了生机和活力,也使读者有了更美的享受。”^[19]

[参考文献]

- [1] 时统宇.论中国第五代记者[A].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87-91.
- [2] 张万象.突破常规 手法新颖[A].北京新闻学会.好新闻(1982年)[G].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31.
- [3] 黎明洁.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71-172.
- [4] [5][6][7][9][10][11][13][15][16][17] 郭玲

春.郭玲春作品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21,220,205,228,209,211,214,3,228,227,229.

- [8] 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新闻写作教程[M].褚高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35-150.
- [12] 李希光.畸变的媒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1.
- [14] 中国新闻学会.好新闻(1984年)[G].北京:内部发行,1985:46.
- [18] 董桥.语文小品录·新闻是历史的初稿[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39.
- [19] 新华出版社.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G].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554.

(责任编辑:朱德东)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On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ion of Guo Lingchun's News Works

LIU Y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Anhui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s textual style at new era, the journalist Guo Lingchun at Xinhua News Agency made initiative contribution. She is a forerunner to break through the rigid model of Xinhua News Style in the writing of “memorial meetings news” and conference news by expanding the new path for meeting news writing and by gradually creating her unique style in news writing so that her important position in news writing is founded based on this so as to shape the reform in news writing at new era.

Key words: Guo Lingchun; Xinhua News Style; new era; news textual style; obituary news report; meeting news